

大学之道

中国教育首要问题是培养真正的“人”

钱颖一

在中文中,“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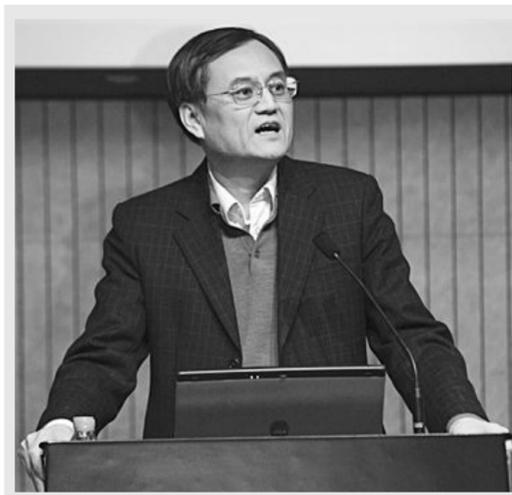
事实上,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反观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的传统,其实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教育也就自然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



“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是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管理都是社会科学,而人

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我们说人文科学,但不说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判断、是解读。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话的价值。

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是这样来解读人文的: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做人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

域外传真

英国大学事务大臣否认上涨学费

克莱尔·肖恩

英国大学事务大臣格雷格·克拉克已经取消了上涨学费以及进一步削减高等教育开支的计划。

在近日于利兹举行的英国大学年会上,格雷格表示,当前9000英镑的学费“可以覆盖绝大多数教育机构的绝大部分课程的教育开支,而且当前也存在一些对高额学费课程的支持措施”。他说,他还没有被那些要求涨学费的人所说服。

格雷格认为,英国高等教育处于可持续的财政体系之下,目前状态还不错。“英国的高等教育为全世界所羡慕。”他认为,其他国家看着英国涨学费的所作所为,希望复制英国的做法,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勇气仿照英国采取的措施。

当被问及现有的资助体系是否稳定、可持续时,格雷格引用了经合组织教育和技术委员会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谢尔的话,施莱谢尔告诉格雷格,英国是第一个建立了可持续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的欧洲国家。施莱谢尔说,由于没有从其他角度看待投入的回报问题,目前的公共辩论都低估了这一体系的稳定性。

“我们以会计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格雷格说,这才是应有的方式。不过,根据施莱谢尔的观察,它又不是这样的问题。他很清楚,这笔投资应该对受教育的个体以及纳税人负责。

不过,英国大学组织主席、萨里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斯诺登并不同意目前高等教育体系的财政系统很稳定这一观点。会议期间,他呼吁政府应该保障大学的稳定性。他说:“我们需要全国都支付得起的、稳定的资助制度。”

斯诺登补充道,通货膨胀已经使得大学不得不动用它们的现金储备了。“现实情况是,大学正在用现金储备来维持运转。显然,这不是一个所谓稳定的状态。”

“我们需要回头寻找这种稳定性。对我来说,人们迟早都会建立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模型,这肯定也和通货膨胀有所关联。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一模型该如何建立。”斯诺登列出了三个主要方向供政府考虑,包括缩小英国在研究与创新方面的投入与其他主要竞争者的差距;在移民政策方面,不要限制学生;开发与整个英国都密切相关的、可持续的学生资助体系。

格雷格表示,他致力于扩大合作备忘录,而且认为研究生教育正日益成为扩展生源竞争的新前线,尽管他目前还没有任何该领域的发展政策。

至于是否认为学生应该从净移民指标中排除,格雷格回避作答,而是强调,对于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并没有人数上的限制。“经合组织的移民指数遵照移民的标准定义,你可以选择加入或者离开。”

(作者供职于英国《卫报》,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高教观点

国内高校在摆脱苏联式理工科优先、组织化学术优先、服务国家优先的教育管理传统方面尚不彻底,更不充分。比较香港高校,大陆顶尖高校最大的短板是教育管理体制,即教育行政化问题。

通识教育的香港经验

田飞龙

通识教育改革是近年来国内高等教育界的一大热点。尽管香港高校的通识教育开始较晚,但比内地稍早,也颇具特色。比较二者,我们也许可以得到某些改革上的启示。

香港大学是从1995年才正式开始建立大学层面的通识教育委员会(决策机构)和通识教育部(执行机构)的。但从目前香港通识教育的发展来看,逐步形成了香港大学的“全才教育”模式、香港中文大学的“均衡教育”模式和岭南大学的“博雅教育”模式,侧重自然科学类现代知识和人文伦理类道德知识的传播及其人格养成。

香港通识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第一,以课程板块为主,以“通选课”模式开展,而不是以“经典阅读”为主;第二,缺乏严格的“公民教育”,而是一种适应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普适价值的超国家的“人权教育”,这与香港社会在历史教育上的“近代史空白”以及在政治上对“国民教育科”的抵制密切相关。前几年,本属正常现代国家之正常教育成分的“国民教育科”被政治反对力量人为地建构成“国教运动”。这些缺失对于拉近近来的央港政治与文化冲突有很大影响。

内地通识教育的兴起与民族文化复兴和大国崛起中的主体意识形成有关,也与对苏联式专业教育的积极反思有关。内地通识教

育在精神气质上是文明复兴论和人格再造,在技术操作上是美国哈佛模式(课程板块论)和芝加哥模式(经典研读论)的不同借鉴与改造,中国传统的“书院”因素也有一定体现,其中甘阳的博雅学院实验班和北航的高研院实验班大体坚持了“经典研读”和“小班化”的路径。其他学校,比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则有着“课程板块论”的显著痕迹。至于何者为优,尚需时间与实践检验。比较而言,香港高校在通识教育的管理模式、课程设计、培养目标上有着整套经验和方法,内地可以加以适当研究和借鉴。

我第一次来香港,对香港高校的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治校与学术个人主义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教授群体在学校和学院治理中具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行政领导是高度职业化的,行政不干预学术,也不参与学术组织,甚至“院长”之类的职位也没什么吸引力。教授们宁愿“无官一身轻”,从容进行自身的学术与社会活动,我称之为“学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保障了学者人格的完整和学术过程的绝对自由。若国内高校去行政化得当,教授和学术在高校中获得主导地位,则其创造的潜力不可限量。由此观之,国内高校在摆脱前苏联式理工科优先、组织化学术优先、服务国家优先的教育管理传统方面尚不彻底,更不充

分,国家在政治上尚无法有效地理解学术自治与自由系统对于现代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的更高层次意义。

比较香港高校,我觉得大陆顶尖高校最大的短板是教育管理体制,即教育行政化问题。这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高校不乏一流的学生和师资,但缺乏真正符合高等教育属性和运行规律的管理体制。教育行政化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教授治校原则难以得到制度化落实,高校管理“叠床架屋”,政治、行政、学术诸多要素混杂无序;第二,课题控制机制与职称评定行政化,导致教师群体处于政治上的“消极配合”状态和学术上的“短视功利”状态,无法展现完整的人格和精湛的学术,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整体的创造力和国际影响力,而且严重影响了对学生的培养质量;第三,与高等教育无实质关联的组织性活动和公共课,造成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和学生时间极大挤占,这一空间应严格改造为真正的通识教育空间;第四,学会体制的行政化与学术评价的数字化,重学术数量和人际关系学,轻学术质量和正常学术传统,学风被官风污染。解决以上问题,也是“钱学森之问”在这一层面上的部分解答。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为作者于该院2014级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有删减。)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重于“才”。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为作者于该院2014级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有删减。)

教育部亟须出台《高校教师伦理规定》

胡乐乐

据报载,近日,由256位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两封公开信,分别寄往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信中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术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时建议厦大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

厦大男教授与女学生的性丑闻引起围观、热议。厦大校方信誓旦旦地发出一纸公开声明,要立即调查、严肃处理。然而,已经整整过去2个月,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个中的原由,恐怕一是厦大认为这是自家的大丑闻,用拖延的策略,最终不了了之;二是认为吴春明是厦大人类学的学科带头人,一旦他被处理了,厦大的人类学学科恐怕会一蹶不振。

老实说,师生性丑闻绝不是厦大一所高校独有的,只不过吴春明事件被曝光了而已。现在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发生性丑闻的大学应该如何处理涉事教师,才能真正体现教育部对高校师德的“一票否决”规定?虽然教育部和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2011年12月23日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里对师

德的处理有明确规定,但遗憾的是,这个《规范》没有高校严格执行。

展开来说,大学教师的伦理问题一方面并不只限于师生肉体层面的关系,因为有些不正当的师生关系只是精神层面的,而有些则是肉体和精神兼有;另一方面还包括大学教师与非学生的异性之间的关系,有的大学男教授嫖娼,但被校方从派出所寻回后继续为人师表。这样违背师德和伦的教授,大学不严肃处理——开除,按理来说天理难容。然而,如今的大学几乎都在包庇教授——事情一旦发生,能保护则保护。

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大学是如何处理类似的事情的。美国许多大学都明确规定,异性师生不能仅单独两人待在一起,即必须有第三者在场;师生之间不能有超出正常的师生关系,一旦发生不正当关系,调查清楚后绝不轻饶——教师嫖娼和乱伦必须解聘。2010年12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爆出丑闻——著名政治学教授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因被怀疑与24岁女儿乱伦3年遭到起诉。案发后,校方立即要求其不再上班和教书,被判刑后再被解聘。如此严厉的处理,让

大学师生的伦理关系总体维持正常。

为此,我们希望教育部抓紧时间制定、公布《高等学校教师伦理规定》,严肃处理不正当的大学师生关系,并对有违伦理的大学教师做到真正的“一票否决”,坚决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大学教师队伍。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于近日发布,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此轮高考改革,在高考科目、特长生加分、地方高考指标计划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调整,可以说,这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但是,综观整个高考方案,尚缺最重要的博弈,即学校、受教育者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博弈。高考改革有学科博弈、地方博弈、学校博弈、考生博弈,但在权利和权力的博弈方面却还不足,导致政府放权的改革极少,或者十分模糊。

学科博弈体现在文理不分科以及高考成绩分两部分上。按照方案,考生的高考成绩由“3+3”组成,前一个“3”是语数外,后一个“3”是考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科中自主选择3个科目的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如果高校在录取时,可由学校自选3门科目,那意味着高中将消除之前的副科,学生可自由组合自己的高考科目。这是学科博弈获得的学科平等地位,当然能否真正落实,还要看学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办学的现实条件——学校会否主要开设几门科目让学生选择?所有高中有条件开设出那么多的课程,组合成不同的小班吗?

地区博弈体现在调整各地的高考录取计划上,方案要求,要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同时部属高校要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力争到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这是调整各地的录取计划,以使全国录取率趋于均衡,这也是各地,尤其是高考资源相对匮乏地区,争取高考利益的结果。虽然这还受制于分省按计划录取体系,只能在原有框架上调整,但能够让贫困地区看到缩小与发达地区高考录取机会的希望。

学校博弈体现在取消录取批次上,就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2015年起在有条件的省份开展录取批次改革试点。众所周知,高考的录取批次制造了高校间的不平等竞争,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取消录取批次就让所有学校在同一层次竞争,而不再受批次限制,这也是高校(二本、三本)院校努力争取的结果——在存在批次的情况下,二本院校只能招收一本院校招完未被录取的学生。这一措施,究竟能得到多大程度上的落实,还要看各地的具体实施,也需要二本、三本院校持续争取自身的权利。

考生博弈则主要表现在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上,从2015年起,全国将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另外,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教育部备案,原则上只适用于本省(区、市)所属高校在本省(区、市)招生。高考加分腐败已经严重伤害高考公平,一名学生加分造假就会改变整个高考录取格局,因此,在当前取消腐败从生的高考加分,可让考生更加公平地参加高考。

大家不难发现,以上这些博弈,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零和博弈”的色彩,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的利益减少。因此,有人戏称,高考改革不管怎么改,反对和赞成总是一半对一半,比如,文理不分科,各科均衡发展的学生觉得有利,而偏科的学生则暗暗叫苦;调整地区招生计划,不发达地区欢迎,发达地区不高兴,认为补偿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不合理;取消录取批次,二本、三本院校增加了竞争的信心,一本院校,尤其是以往在一本录取垫底的院校却为生源发愁;取消特长生加分,确有特长的学生认为一刀切忽视了学生的个性、特长发展,而本没有特长的学生自然欢迎这一新政。

何以至此?高考改革难道就是“零和博弈”吗?非也!这主要是因为改革缺乏最重要的博弈,即学校、受教育者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博弈,更进一歩说,目前这些“博弈”都是由行政主导进行的,但真正应该推进的政府放权——把自主权给学校,把选择权给学生,却还甚少见到。只有推进政府放权,让学校获得更多自主权,学生获得更充分的选择权,改革才能避免“零和博弈”,而对于所有的地区、学科、学校、学生都有利。

推进政府放权,主要在打破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实现考试社会化、学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如果高校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那么,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将不存在;各地考生可在任何地区自由报考,以高考成绩申请大学;大学独立录取,在录取时,采用多元评价,这不就解决了录取批次问题(学校独立自主招生,不存在批次一说)、高考按户籍报名问题(考生自由报考)、学生的自由选择问题(学校实行多元评价,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以统一成绩和中学学业成绩去申请大学),以及个性、特长发展问题(将特长纳入多元评价体系)?而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保障每个受教育者的权利,让学校获得充分自主、平等的办学空间?

在新高考改革方案中,录取制度改革笔墨不多,这是因为与权力的博弈甚少。背后的原因又是因为整体改革就是由行政部门自身主导的。因此,如果希望高考改革深入推进,就必须启动与权力部门的博弈,应由全国大讨论、审议高考改革方案,其间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甚至可发动民间机构、社会组织提出高考改革方案,一同参与讨论、审议,才能实行有效博弈,推进政府放权,带来新的高考改革局面。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高考改革尚缺最重要的博弈

熊丙奇